

论互文文本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杨焯, 纪玉华

(厦门大学外语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具有互文特征的文本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常遇到的, 如何处理好源语信息和目的语信息之间的完整传递, 尽量减少文化缺损是每个译者都面临的棘手问题。但是, 具有良好双重文化修养的译者只要对互文性的概念与类别、互文文本中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译者的能力和任务等方面有详细的了解和体会, 正确掌握互文翻译的处理方法, 就能够克服互文文本的翻译困难。

[关键词] 互文文本; 可译性限度; 互文性空间; 外文本预设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8X(2003)01-0098-03

一、互文性的概念与类别分析

Kristeva 于 1969 年率先提出了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的概念。她认为, 当前文本以先前话语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在互文文本中, 蒋晓华指出: “从文本之网中抽出的语义成分总是超越此文本而指向其他前文本 (pretext), 这些前文本把现在的话语置于与它们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更大的社会历史文本之中”。

在分类方面, Hatim 和 Mason 将互文性分为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两种。当互文性能引发超越文本之外的知识和价值系时称为积极互文性; 只是为了让文本连贯时称为消极互文性。

互文指涉也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存在于文本之内的互文关系 (内互文性), 另一类是存在于不同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 (外互文性)。

以潘威廉的《魅力厦门》一书为例, 互文这一修辞特点在其中就有多处体现。如:

Taiwan—so far at times, but getting closer. In September '98, we held our first annual Taiwan-Xiamen fishing contest. And afterwards, like fishermen the world over, both sides headed home to exaggerate the size of their catches and bemoan the big ones that got away.

It was nice to see both sides angling instead of wrangling. They're family, after all. But we Laowai are another kettle of fish.

句尾的 “another kettle of fish” 的应用不仅是形容在台湾和大陆的交往过程之中扮演旁观者, 并不介入其中的外国人。“fish” 一词既是对上一段关于 “fishing contest” 的描述的照应, 又是为下一段中继续描写外国人做出一个灵巧的过渡, 可谓是承上启下, 达到了使文本连贯的目的。“fish” 一词体现了消极互文性, 两次出现。

另外, 在 “We hope you will enjoy our enchanting island, which for centuries has woven her spell over Laowai and Laonei alike with her balmy climate, her rolling green hills dotted with gardens and pagodas and temples, and……” 这句中, 没有阅读前文本的读者不一定能意会到 Laowai 和 Laonei 的意思。其实前文本已经给出了说明:

Get used to hearing Laowai. Its Chinese for “venerable outsider” or “foreigner” (roughly 4/5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I often respond with my own term, Laonei! Or “venerable insider”.

这被称为内互文性。

“So when in Rome, wear a sandwich bag.” 这句话则是对内互文性和外互文性的双重体现。既

[收稿日期] 2002-08-20

[作者简介] 杨焯 (1973-), 福建人, 厦门大学外语学院英文系硕士研究生, 从事英汉文化语言学研究。

指向人人皆知的英语谚语“W 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 ans do.”又暗示了文章所提到的趣事,产生了趣谐的效果。

二、互文文本中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在处理具有消极互文性和内互文指涉特点文本的时候,译者较容易保留原有文本信息的完整。但对于能引发某一文化群体联想的积极互文性和指向前文本的外互文性,译者不但难以准确翻译,而且因其文化的局限性,也不一定能完全解读其文本含义。比如说,对于不了解“W 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 ans do.”这句话的读者来说,“So w hen in Rome, wear a sandw ich bag”的指涉简直莫名其妙。再举例而言: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陶潜《归田园居/其二》)

“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岳飞《满江红》)

这两句中出现的“虚室”和“凭栏”两词具有典型的积极互文和外互文的特点,使得原有的文化意味很难在译文中保留。其原因在于,“虚室”在中国历代古典诗词中都频频出现。该词不仅有字面上“简朴的居室”的含义,而且也指代着知识分子“摒绝了尘世杂念的心灵世界。……如果看不到这种因互文关系而带来的词的内涵变化,就很难在译文中传达原文的韵致。”“凭栏”一词亦是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这一符号意味着有某种强烈的情感或情绪要宣泄,或忧国忧民,或儿女情长,或孤愤难平,不一而足。”这种文化韵味无法通过字面上的“empty room”或“leaning on the railings”传达,是不可译的。

在“对可译性问题的探索”一文中,郭建中认为可译性是有限度的。分别论证了语言(包括词形、语音、词汇、语法、文体风格)和文化的不可译性后,他提到J. C. Catford的观点:“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严格区分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因为语言空缺,实际上是由文化空缺造成的。”

这说明了在互文文本中,源语读者的文化意识中具备的足够“外文本预设”在目的语读者群体中的普遍缺乏,由此导致的翻译过程中的信息缺损是必然的。“文化含义,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翻译的集体无意识。”

三、互文翻译的两种处理方法

随着翻译理论的进步,对译文标准的衡量逐渐趋向宽松。J. C. Catford 就认为,“可译性的确似乎是一个连续体(cline)而不是一个明确的二分体。原语文本和单位的或多或少是可译的,而不是绝对可译的或不可译的。”过去以“形式对应”为翻译标准的看法,已逐步让位于以“功能对等”的翻译主要标准的看法。

以奈达为代表,他曾于1947年提出过动态对等观念,后来又在1986年提出功能对等概念。就上述的互文现象的翻译而言,奈达曾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法颇有实效。这就是,在遇到原作者期望读者看懂作品而在作品中表达出几层含义的时候,“译者一方面可以通过同样明显的方式把它译出,另一方面可以用注释加以说明。……译者最好通过各种证据,选择最切近的那层意思放在译文的正文中,而把另一层意思放到注释里。”由此,我们认为,在互文文本翻译过程中,适当的加注可以说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这样,中国古典文化中含义深远的“虚室”和“凭栏”也能为目的语文化的读者领悟。

另一种处理方法则是对此不做额外添加处理,只保留原有形式结构。Bassnett M cGuire 认为,在翻译文学作品或权威文献时,体现了该作品特点的重要的表达法必须保留下来。即使目的语读者在短期内不能对此加以理解或欣赏,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将变得为人们所熟知。

总的来说,可以以两种方法处理具有积极互文和外互文指涉的文本,一种是加注释,一种是对原文本予以保留。如《魅力厦门》中的这段话:

Many a Chinese city has tried to ban auto horns, but unsuccessfully, for every driver in China has a motive a minute for joining the raucous ranks of honkies. But Mayor Hong decreed, “No horns.” And it was Silent Night overnight.

对熟知西方文化或源语读者来说,“Silent Night”包含了一个文化意向,即人人都传唱的一首圣诞歌曲,歌词第一句即为“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所以,在这里,“Silent Night”还指向“圣诞平安夜”,由此蕴涵了平安祥和的意思。也因此间接地对政府的决策带来的良好社

会效应予以褒扬。不顾互文特点翻成“安静夜”或“寂静夜”的话，不但出现文化缺失的遗憾，也削弱了作者的本意。所以这里的“Silent Night”既可直接译为“平安夜”，也可以在一旁另外加注，向读者具体解释这一文化风俗。

四、译者的能力和任务

由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缺乏足够的两种文化的了解就无法正确完整的传达作者的原有意图，所以译者在面对翻译文本时一定要认真揣摩，处理好互文段落。根据 Hatim "Mason 的观点，在互文文本面前，“译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寻找互文性标记，然后寻根溯源，找到互文性标记所在的文本，译者跨的这一步称为“互文性空间”。此时译者应该问这样几个问题：

- (1) 找到的指涉有什么交际价值（语境、语式、语旨特征、时间、地点等）？
- (2) 该指涉在前文中有何语用价值？
- (3) 作为符号，该指涉在与其他符号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居什么地位？

最后，译者还应重新评价该符号在原语中的作用，特别是它在文类、话语和语篇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应该尽量在译文中得到保留。

Mary Snell-Hornby 则认为：“我们把文化视为知识、技能、观感的综合体，这对于我们怎样研究翻译非常重要：如果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那么译者就不但要能够把两个语言都运用自如，而且必须熟识两个语言的文化。换句话说，他不但具有双语能力，还要掌握多重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奈达也强调，“如果因译者对原作的文化背景不了解，而把原文中可能含有两层或多种意思的表达法含糊其辞的译出，那译文不能通过”。由此可见，除了在理解文本过程中的认真细致，译者本身的文化底蕴也是极为重要的。这是译者一个基本素质，只有具备了这一素质，才能担当起“将一种文化介绍给另一种文化（to bring one culture into another）”的重任。

五、结语

具有互文特征的文本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如何处理好源语言信息和目的语信息之间的完整传递，尽量减少文化缺损是每个译者都面临的问题，互文文本的翻译难度客观存在，但一个具有良好双重文化修养的译者是应该而且能够克服这一困难的。

[参考文献]

- [1] Hatim, B. "Mason, I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2] Bassnett-McGuire, S. Translation Studies [M]. Richard Clay Ltd, 1980.
- [3] Nida, E. A.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M].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86.
- [4] Snell-Hornby, M.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5] Yang, Shizhuo. An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J]. London: The Linguist, 1998 (4).
- [8] 郭建中. 对可译性问题的探索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88 (增).
- [9] 蒋骁华. 互文性与文学翻译 [J]. 中国翻译, 1998 (2).
- [10] 谭载喜. 新编奈达论翻译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 [11] 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 [C].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